

■人文自然社会科学

张、周首次肤施密谈新辨

——西安事变纵横考之十一

刘东社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陕西西安 710100)

摘要:张学良与周恩来首次肤施密谈之内容十分广泛,周恩来事后的报告电并未能囊括无遗。对蒋策略应是会谈中极其重要且有争议的一项内容。张、周都曾力图说服对方,但均未能成功。会谈的结果与其说是谁说服了谁,还不如说是求同存异更为恰当。

关键词:张学良;周恩来;肤施;“抗日反蒋”;联蒋抗日

中图分类号:K2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8)12-0108-06

PDF 获取: <http://sxxqsfx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8.12.023

New Perspective on the First Secret Meeting between Zhang Xueliang and Zhou Enlai in Fushi

LIU Dong-s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00, China)

Abstract: The first secret meeting between Zhang Xueliang and Zhou Enlai in Fushi discussed a variety of issues, which are not completely included in the telegraph sent by Zhou Enlai after the meeting. The strategy to handle Chiang Kai-shek is an important but disputed topic in the secret talk. Both Zhou and Zhang attempted to persuade the other party but failed. The talk didn't reach an agreement but successfully sought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Key words: Zhang Xueliang; Zhou Enlai; Fushi; Anti-Japanese and against Chiang Kai-shek, take unified action with Chiang Kaishek against Japanese

1936年4月9日晚,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所作的竟夜长谈,在张与中共关系演进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迄今为止,学界对此次会谈的内容、结果等问题,依旧存在着较大分歧。本文拟利用相关档案文献及回忆资料再加考辨分析,以求能获得较为客观、准确的认识。

一、新旧两说分歧的焦点所在

首次肤施密谈的时间在4月9日晚8时至次日凌晨4时,参加者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

哲、刘鼎5人,这些迄无疑义。会谈地点,一般回忆材料和史书多认定在城里天主堂内,则欠妥当,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基督堂。^[1]

10日晨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偕李克农、刘鼎返回延河南岸的川口,因遇雨受阻,曾在此短住,并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告了会谈情况。现在公布的周恩来报告电有两大段文字:一是《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刊出的《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2]3-4}注明日期为1936年4月10日;一是《张学良年谱》中公布的《周恩来关于与

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的后一大段文字，时间为1936年4月11日。^{[3]673-674}杨奎松先生曾屡次批评该电公布者注明之日期（4月10日）不正确，认为应作11日，却未提供任何说明或依据。

据戴镜元回忆，10日当天，周恩来先向中央发电简要报告了会谈经过；11日晚8时后，又发一长电详细汇报了会谈内容。^{[4]50}注明为10日所发电中，有刘鼎“今晨随我们进来”一句，据此可知该电或许就是10日所发。此电，彭德怀、毛泽东在11日下午5时曾致电林彪、

聂荣臻予以转述。^{[5]52-53}如此，周在川口向中央的报告，究竟是一长一短两电（如戴镜元回忆），还是一份电报因文字过长而分作两次拍发？尚待进一步深究。为方便计，以下引用周报告电时，还是分作两段来处理，即分别称之为短电（10日电）、长电（11日电）。

关于会谈内容，张学良在50年代复蒋介石长函（即《西安事变忏悔录》）中称：“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并举良曾参加某次会议，席间蒋公曾以‘等待死去，再谈伪满事’答复某人语以证之。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恨而抗日最热诚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并开列了若干具体条款。^{[6]1197-1198}

考虑到张写此函时尚处幽禁状态，其内容难免不受当时政治环境之影响，且事过20年左右，张氏手头又无材料可资参考，加之行文亦有失实处，故学者们一向未敢尽信之。

另一种关于会谈的系统回忆，主要来自于刘鼎1975年间追忆所写成的札记。《刘鼎札记》将会谈内容归纳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方针；抗日救国的道路；联蒋抗日；联苏；停战、通商、合作；培养干部等6个问题。^[7]整理该札记的张魁堂先生在其著作中转述称：“联蒋抗日是张学良希望解决的最大问题”，“是这次会谈中花时间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张学良“最关心和希望解决的大问题之一”。据说张认为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蒋现在“处在歧路上”，“共产党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蒋氏“剿共”误国政策。刘鼎称，对于张的联蒋抗日主张，周表示说：“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

答复。”^①结果，中共中央采纳了张的意见，5月5日红军回师通电就不再提反蒋口号了。

对于《刘鼎札记》中的说法，杨奎松先生依据相关档案文件分析认为，不仅周恩来的报告中“没有任何一点谈到‘联蒋抗日’问题”，“报告中根本不存在”所谓联蒋抗日问题；而且，“第一，关于对蒋策略问题的讨论，在延安会谈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双方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也颇为具体，费时甚多，而对蒋的问题，却只有周报告中所谈到的简单的几段话。第二，在会谈过程中，张学良不曾直接劝说过要中共放弃反蒋转而逼蒋或联蒋。否则，周恩来不会在电报中避而不提。周恩来更没有向中央报告张学良的逼蒋或联蒋立场。”进而，杨先生依据4月22日周恩来致张学良函，4月27日和30日刘鼎给李克农及周恩来的报告，5月5日曾希圣致彭德怀、毛泽东电，5月7日朱理治给中央的报告等函电认为，“延安会谈如果促成了什么人对蒋政策的改变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肯定地说，被改变的决不是周恩来。”换言之，延安会谈后，“张学良不仅从此与蒋介石离心离德，而且是分道扬镳了。”张不仅未曾劝说过中共联蒋抗日，而且他自己更是“要反蒋而非逼蒋”了；因此，“延安会谈之后，究竟谁说服了谁，谁受了谁的影响，应该是一清二楚了。”^{[8]60-69 [9-10]}

现在看来，《刘鼎札记》中的说法和杨奎松先生的新结论之间，确实存在着极大的距离。新旧两说分歧的焦点，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肤施会谈的内容理解上有出入，最突出者即体现在对蒋问题上；二是对会谈的结果，双方看法截然相反。一个称张影响了中共，促成中共后来改取“逼蒋抗日”方针；一个认为是中共影响了张学良，张转而与蒋分道扬镳，并准备反蒋而非逼蒋、联蒋。两说分歧如此之大，究竟谁是谁非？抑或两说俱误？确实难以遽下断语。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双方产生分歧的总根源，恐怕还在于对会谈内容的理解差异上。因而，仔细梳理、辨别会谈之内容，便显得尤为关键。笔者以为，今天欲探讨此类问题，周恩来向中央汇报的电文应该是最可信和最基本的原始资料，会谈后形成的相关文件及当事人的回忆亦可酌作参考。更重要的是，为避免就事论事、各执一端局面的延续，只有将肤施密谈置于张学良与中共及与蒋介石关系演变的整个过程中，前后联系起来综合考察，才有可能最终接近于事实真相。

二、肤施密谈话题广泛，周电未必囊括无遗

还在4月6日，彭德怀、毛泽东复王以哲转张学

良“鱼午”电中,开列了拟商谈的5个问题:“1.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 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 联合苏联及先(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 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5]47}

将“鱼午”电与周短电中“与张谈的基本及具体问题”的8条相比对,很明显,此8条正是就5个问题商谈的结果。即周电A、B、C、E4条是对“鱼午”电前4个问题的答复,F、G两条是关于第5个问题商谈的结果。此外,周电中增加了“对蒋问题”的D条以及向张处派代表和电台通电等具体问题(H条)。由周电可知,张学良对中共提议的5个问题回答得大多简洁、干脆,基本上“完全同意”、“完全赞同”,态度十分明朗。只是在某些问题上,他须稍作解释或略有保留,如“未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再如,对红军行动方向,他在与李克农洛川会谈时就曾建议北出宁夏,再转绥远前线,总担心或判断红军向东难以立足,至河北难以取胜。肤施密谈时,张显然旧话重提,且看法未变。当然,张也明白,诸如红军行动方向这样战略性的大问题,不是他一个局外人三言两语所能改变得了的。既然红军要“坚决东向”,他也就只能全力配合,答允可通知在河北的万福麟部与红军联络。至于派代表赴苏联和经济通商等问题,几乎简单几句话就可解决,正如周电所说的那样,张在经济、通商、交通等问题上帮助红军“确具诚意”。对于蒋氏电责并令张、杨部队北上打通清涧、绥德和延长、延川地区并封锁红军回渡问题,张建议红军袭扰韩城、澄城等地以牵制杨虎城部,并让陈先瑞部从陕南北出扰乱西安和关中地区,这样他就有借口暂不北进。敷衍一个月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对此,周恩来显然基本同意并予以接受。总之,对于中共拟定的5个问题,张、周之间并无太明显或太大的分歧,双方反复商谈的空间并不大,花费的时间应该不会特别多。

再就周长电内容来看,张、周会谈的话题十分广泛,诸如对未来抗战的预估、英美和苏联是否帮助中国抗战、红军行动方向、东北军之军事行动、中国的出路、法西斯主义问题、对晋阎的认识和态度、南京蒋系各派立场等等,有些已远远超出了中共5项议题的范围。甚至于我们还可以断定,周恩来的报告并未能囊括全部的谈话内容。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周回去后会有极其详尽的口头汇报,有些不适宜通过电报或在电报中不易表述清楚的问题,周自会进

行口头汇报。

举一例为证,《刘鼎札记》中说到张、周谈过培养干部问题,此事在周报告中只字未提,但4月13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毛泽东报告安排与张、杨联络和派人赴苏等具体问题时却称:“决派刘鼎留在张学良处。刘鼎同志与张学良继续开展谈判,增进具体办法,并协助张学良组织其干部(东北军有抗日情绪,但无组织,且求不成得力人才,是张学良最大弱点,故张颇佩服蒋贼之黄埔生,而自己连教导团或随营学校都没有),灌输抗日主张,与张同驻洛川。”^{[8]80}两相对照,则张、周似乎曾谈过培养干部问题。

如果对此还有疑问,我们可再举一例为证。张学良称他与周曾就南京中央是否抗日等问题“辩论多时”,后“周询及广田三原则”,张答以蒋“决不会应允”云云。4月22日晨,周恩来致张学良亲笔函称:“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日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制,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11]87}很明显,正因为肤施密谈中张声称蒋不会应允广田三原则,并为此而与周反复辩论,周函才不厌其烦地例举事实说明蒋受日帝要挟而接受广田三原则,“屈服难免”,指望蒋氏抗日则河清无日,以此证明张氏判断不确;同时亦包含着打消张氏“相信帮蒋能抗日”等等幻想之意。此亦可反证,张氏回忆中关于蒋是否接受广田三原则之辩论确系事实,但此事在周报告中同样了无踪影。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周电固然是了解肤施密谈内容的最可信资料,但却不能视为毫无隐漏的最完整的资料。质言之,周恩来报告中未曾提及的某些谈话内容或情节,不等于在事实上就未曾发生过。如果完全以周的电文作为判断取舍之标准,有时不免会差之毫厘。相反,对于口述、回忆等其他相关资料,只要经过仔细的审核考辨,凡属真实者同样也应该予以采信。

三、如何看待会谈中的对蒋问题

争议颇大的“对蒋问题”究竟在肤施密谈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张、周二人围绕着该话题又到底谈了些什么?其结果如何?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仍有

进一步深究的必要。

现在看来,《刘鼎札记》和张魁堂所述的会谈内容与结果等显然是很不准确的,这有杨奎松先生的详细考辨可以为证。不过,杨先生的考辨理由和某些结论,似乎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依据周短电可知,“基本与具体问题”中的D条和长电中“与张谈抗日中的问题”中的第六、第七条,直接谈及对蒋问题;“基本与具体问题”中的A条、F条和“抗日中的问题”之第五条、第十条(B部分和第2条)、第十一条(此系周之判断)均间接涉及到对蒋问题。因此,所谓“对蒋策略问题在会谈中不占重要地位”,“周报告中只有简单几段话”的说法,显然并不准确,且无不轻忽之嫌。

不仅《刘鼎札记》突出强调了对蒋问题的讨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回忆录》和《杂忆随感漫录》中均述及对蒋问题,而且1937年2月5日周恩来与范长江“竟日长谈”时,周也声称肤施密谈时他们讨论“张所提出之两大问题:第一,蒋委员长与抗日关系问题;第二,用法西斯方法谋中国之统一问题”。不管对蒋问题的谈话内容是什么,也不管其结果怎样,但张、周就此问题曾进行过相当深入的讨论,当无疑义。因此,“对蒋问题”在会谈中虽未必属于费时最多、最重要的问题,却也绝非“不占重要地位”的小事一桩。

早在张学良与中共接触之初,中共确实希望张学良、王以哲能积极赞成“抗日反蒋”,然而,张一开始即不同意把蒋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更无法接受反蒋主张。中共对张氏的立场和态度非常清楚,这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李克农发出的谈判“训令”中,在张、李的洛川会谈中,在中共晋西会议对张的认识判断上,均有明白无误的反映。杨奎松先生曾一再强调,在拟定肤施会谈的内容时,中共“特别回避了对蒋问题的讨论”,不再要求周恩来等“力劝张学良参加‘抗日反蒋’”,而且干脆主张周恩来适当地考虑回避这个问题的讨论”,谈判中周“并不多谈对蒋问题。并非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避免一切争论而已。”然而,谈判历来都是双方面或多方面的事情,“对蒋问题”自然也就并非中共单方面一厢情愿想回避就一定能回避得了的。事实上,对张学良及东北军而言,“对蒋问题”之重要性不言而喻。既然张学良早已表明了“抗日不反蒋”的态度,而且对中共的反蒋主张感到疑虑重重而难以理解,甚至还为此与李克农有过争执,就此问题他再主动提出来与周恩来进行商讨以至辩论,亦属顺理成章的事情。

更何况,张、周商谈的不少问题,在客观上也确实无法回避或绕开对蒋问题。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项,不解决对蒋问题,即使张学良对中共的主张“完全同意”,充其量也只能做到东北军不打红军(还是暗中),却不能从根子上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所谓“一致抗日”的一致性也就无从谈起。再如“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问题,中共一直倡导的是“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不解决对蒋问题,又如何能达到“全中国统一”的规模?甚至如“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一条,即使张学良“完全赞同”并允诺暗中相助,不解决对蒋问题,蒋氏自会出兵阻拦而中共亦无可奈何(正如后来实际所发生的那样)。总之,无论中共方面是否曾有意回避,但在主观上(张学良一方的需求)和客观上(涉及国共关系及联合抗日)该问题都无法回避。也不论周恩来报告电中对此问题写的是多还是少,它都肯定是肤施密谈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内容。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断言,对蒋问题在肤施会谈中的地位或重要性,并不仅仅取决于周恩来在电报中文字表述的有无与多少。^②

根据周的报告,我们可以肯定,在讨论对蒋问题时,周依旧劝张接受“抗日反蒋”主张,而张则答以“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那么,张学良有没有可能也劝说周和中共联蒋抗日呢?杨奎松先生就坚决否认有此可能,其理由之一是周电中无这方面的内容;理由之二是张学良对蒋采取了帮蒋抗日与暗中准备另立局面的两手,“有谁能够想象,处在这样一种将信将疑,连自己都准备另立局面的矛盾态度之中,张学良会力劝中共应当拥蒋、联蒋?”

其实,杨先生的理由之一,我们上文已经做了回答。如果真要抠字眼的话,周电中倒还真有涉及联蒋的间接信息。在张学良向周恩来介绍“南京各派蒋系”的立场态度时,曾提到陈立夫主张联俄,冯玉祥、于右任主张联俄联共,唐生智主张抗日,陈诚、胡宗南主张抗日不再“剿共”等等,末了“张主张我们写信给陈、胡并CC派”。张还“认为董牧师再来(董有信又云将动身)必有进展,并主张用东北军与红军的关系”。陈诚、胡宗南乃正牌黄埔系的“天子门生”,二陈的CC系亦是蒋之腹心,张学良建议中共给这些人写信联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属不言自明的事情。董健吾担负的是沟通南京中央与中共联络的使命,张学良相信董牧师再来必有进展,当然是指国共两党中央接触商谈方面的进展。如果两党中央都在逐渐接近,在商谈停战和“收抚”中共及“收编”红军

方面有了进展的情况下,张学良究竟是追随中共反蒋还是主张中共联蒋,亦属不言自明的事情。

至于第二个理由,我们承认张氏确有两手准备,但那暗中另立局面的一手,实在说来,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的预留后手或万一之策。在张学良看来,蒋有民族情绪,领导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当然,他也知道,蒋身边颇多亲日派,导致蒋极矛盾而不能下抗日决心。万一蒋确实降日,他才会离蒋另立另干,对这种可能性他当然不能不预作准备。但在目前,他起码还相信蒋会抗日,正如周恩来会谈后所说的那样,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干。”换言之,只要蒋与南京政府不公开降日,只要蒋还有打算抗日的表示,张也就很难与蒋分道扬镳,很难对南京方面彻底绝望。杨奎松先生由于过分渲染和强调了张学良“帮蒋”不成时的万一之策,遂不免夸大了张氏追随中共反蒋的可能性,以至于连张学良劝说中共联蒋的可能性也都一概予以否定了。事情很明显,既然周恩来可以在会谈中劝说张学良反蒋,那么张学良为何就没有可能劝说中共联蒋(中共是否接受是另一回事)?除非在洛川会谈之后至肤施密谈之前,张学良的思想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者是已经完全放弃了联蒋的念头,否则就无法解释清楚这中间的矛盾或前后反差——张何以此前主张联蒋,会谈时却不向周恩来作此提议?

四、再辨“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

还需提及的是,4月22日周致张函中“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等句,张魁堂先生理解为“中共主张有条件地联蒋”。杨奎松先生批评张说“曲解文义之甚,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他认为,“在这里,周恩来主张张学良反蒋的态度可以说是再明白也没有了。蒋介石为日帝所要挟,屈服难免,其进兵山西、抗议苏蒙互助协定,足以为证。以蒋势力之大,排斥于抗日战线之外,固足可惜,但不能为了要抗日,就替蒋介石这样的人做殉葬品。故真要是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就应当迅速准备联合红军,另立局面,揭旗抗日才对。”^{[8] 69}

确实,张先生的理解是有曲解文义之嫌,但杨先生的解释亦未尽妥当。尤其将“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句理解为“但不能为了要抗日,就替蒋介石这样的人做殉葬品”,不仅不符合周函原义,其内在逻辑亦不通顺。如前所述,周函意在说明蒋氏接受广田三原则,“屈服难免”,蒋氏不会也难以抗日。就抗日

大业而言,加入的力量越多越好,蒋氏势力强大固足惜之,但不能因顾惜蒋氏势力而影响或损害抗日大业,不能将抗日大业做了蒋氏“安内攘外”、降日卖国之殉葬品。在这里,周使用了函电中常见的省略主语句式,“惜”、“殉”均作动词用,故“殉蒋氏”之对象指“抗日”而非张学良等。此句中的“以”字作介词,有“用”之义,将其理解成“因”或“为了要”,亦不符合语法与行文习惯。

要之,周函强调的重心是抗日,故所谓“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的“准备”,也就是抗日的准备。联系到肤施密谈时,张学良明确表示“他现在反蒋做不到”,只有在蒋“确降日”时他才离开蒋“辞而另立”,准备“打通西北,自成局面”。故这里的“准备”,确实含有鼓动张离开蒋之意,亦即鼓动张实施其暗中预备的“自成局面”的那一手抗日“准备”。但能否由此就推导出周建议张“联合红军”,“揭旗抗日”以至于“反蒋”?则恐怕未必!因为周函全文是以抗日大义来激励、鼓动张氏,故这种推导起码已超出了周函中极其含蓄的“准备”一词的本义,而不无人为想象的成分。

五、是说服还是存异

至于会谈结果究竟是谁影响了谁、谁说服了谁的问题,恐怕也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简单态度。中共此时采行的是“抗日反蒋”政策,虽然在晋西会议上张闻天曾主张将“反日”与“反卖国贼”区别开来,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敌人”,^{[12]309}却不足以改变此既定政策。在4月6日召开的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时更痛斥蒋氏执行广田三原则、反对红军反对全国人民,是清楚的把自己放在了卖国贼的地位上。次日,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彭德怀,认为蒋令中央军入晋“剿共”,封锁黄河并组织华北反共战线,“显系实行广田三原则,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下公开降日卖国,拦阻红军东向抗日。因此,目前抗日战争,讨蒋已成中心。拟由军委下令讨伐。”^{[12]311-312}很显然,刚参加完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即前往肤施的周恩来,自然不会被张学良轻易说服。以4月7日张、周致毛、彭电与4月22日周恩来致张学良函相参照,可以肯定,在肤施会谈前后,周恩来对蒋氏接受广田三原则、降日卖国之判断,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因此,说周恩来会被张学良的联蒋说辞所打动,甚至于谓中共亦采纳了张氏建言而改变了对蒋政策,明显难以成立。

那么,张学良可曾在肤施密谈中被周恩来的反蒋主张所感染而迅速与蒋离心离德、分道扬镳了呢?

同样也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肤施密谈两天后,毛泽东、彭德怀曾提议派人赴西安购买枪弹、无线电器材、兵工厂器材和中西药材,“与王或张专门接洽此事。张、王是否真有诚意与决心,以其对此事之态度为证。”^{[8]79-80}此后,随着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不断北进且有封锁黄河西岸之势,毛泽东、彭德怀等对张、王是否真有与红军合作之诚意格外担心。4月21日,中共中央曾一度电告张浩并转朱理治、肖劲光等,提出改变过去对六十七军“所采取的暗中协商,公开敌对的方针”,认为“这是有利于对方上层领袖而不利我们的。因为实际上这等于把对方的上层领袖做朋友,而把下层官兵做敌人。”^{[5]59}4月下旬,南京广播曾误报张学良“有事赴欧出洋,手续办理完毕,现飞回西安料理行装”云云,中共方面闻讯“不胜惊异”,反复询问王以哲“是否真有其事?”“究竟是何原因?”并告诫王以哲等:张“不宜远出,否则必中日本与蒋介石之毒计,使东北军(失)此领导中心。必须坚持自己立场,与一切危害东北军之势力奋斗,才有光明出路。”试想想,一方面是中共对张、王之合作诚意尚心存疑虑,一方面是东北军“不能不受蒋令”而北进,导致中共甚至欲改变“暗中协商,公开敌对”之方针;一则虚假的广播消息,就能令中共为之惊诧莫名而草木皆兵,便可以想见双方的互信基础有多脆弱。处此背景之下,说张学良迅速与蒋分道扬镳而决心联共反蒋,恐怕任谁也难以相信。

其实,迟至7月初,在张闻天签署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电中,也只是较客观地说:“今年4月,我们派周(恩来)在肤施与张(学良)会面,秘密谈了一个整夜,以后到5月红军回师西渡时,恩来又到肤施与张(学良)会谈了一次,两次均谈得非常恳切,从而坚定了张(学良)抗日联俄联共的决心。”^{[12]338}张闻天还称:“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我们客观与主观的条件虽都好过蒋介石,但还要用一把很大的力量……”^{[8]111}

由此可见,1936年自春至夏,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就一直处于中共与蒋介石两方的“争夺”之中,虽然中共占据某些优势,但张氏和东北军并未完全倒向中共一方。换句话说,张学良固然赞同联共抗日,但却一直对南京中央仍寄予幻想,总希望着蒋与南京当局能将全国统一起来共同抗战。因此,肤施密谈时,张、周之间在对蒋问题上明显存在分歧,双方谁也未能从根子上真正说服对方。如果要概括此次

会谈的结果,与其说谁影响了谁或者谁说服了谁,还不如用“求同存异”四字来得恰如其分!

[注 释]

- ① 张魁堂所著《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158页的记述,即主要依据《刘鼎札记》写成。然张先生在其《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的第43—48页,却将“联蒋抗日”问题合并于第2项中,遂缩减成5个问题。
- ② 4月11日彭德怀、毛泽东致林彪、聂荣臻电中,在转述周报告电内容时,恰恰就少了对蒋问题的D条,实在耐人寻味。可以肯定,这应该是出于某种需要而省略或删除掉了,而绝不会是什么技术上的疏漏。同理,周恩来汇报电中未写或写得较少的事项,也不见得就全然没有发生或根本就不重要。主要以周电为判断依据而忽略其他资料,难免会有一叶障目或以偏概全之嫌。

[参考文献]

- [1] 刘东社. 张学良会晤毛泽东问题的初步考察——西安事变纵横考之五[J].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2(1): 60—63+75.
-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M].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 [3] 张友坤, 钱进, 李学群. 张学良年谱(修订版)[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4] 吴福章. 西安事变亲历记[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 [5] 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
- [6]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2)[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2.
- [7] 张魁堂. 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二)[J]. 党的文献, 1988(3): 14—19.
- [8] 杨奎松.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M].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95.
- [9] 杨奎松. 究竟是谁说服了谁——关于1936年延安会谈结果的再探讨[J]. 抗日战争研究, 1996(1): 37—53.
- [10] 杨奎松. 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J]. 历史研究, 1997(6): 160—174.
- [11] 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书信选集[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 [12] 张培森. 张闻天年谱(上卷)[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李兆平]